

林心 辞新 论及 其他

王锡荣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014005720

I207.223
05

林以
薛
新
论
及
其
他



王锡荣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北航

C1693278

[207.223
05

0140027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新论及其他 / 王锡荣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72-1683-5

I. ①楚… II. ①王… III. ①楚辞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7268号

楚辞新论及其他

CUCIXINLUN JI QITA

出 版 人 孙建军

作 者 王锡荣

封面题字 王锡荣

责任编辑 邱 荷

文字编辑 王丽媛

封面设计 李岩冰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0千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683-5

定 价 35.00元

目 录

楚辞新论

- 屈原是楚辞的始创者——与冈村 繁教授商讨 / 1
- 屈原被疏后的经历问题新考 / 9
- 试论屈原的政治思想——兼与郭沫若先生商讨 / 23
- 怎样评价屈原的爱国主义 / 43
- 《离骚》的浪漫手法与古代巫术 / 49
- 《离骚》“求女”喻指发微——兼与“求君”说商榷 / 66
- 《九歌》作于汉代考 / 76
- 二《湘》神问题新探 / 85
- 《惜往日》作者问题驳议 / 91

古诗论稿

- 《毛诗序》问题辨说 / 98
- 关于《毛诗序》作者问题的商讨 / 103
- 说《羔羊》——笺《诗》臆得之一 / 111
- 《邶风·载驰》正解——笺《诗》臆得之二 / 117
- 是妇人思夫,还是女子盼嫁——古诗《冉冉孤生竹》辨析 / 124
- 谈《古诗十九首》中被误解的几首友情诗 / 129
- 谈谈《孔雀东南飞》的主要矛盾及其性质 / 138
- 鲍照《梅花落》试解 / 147
- 汉魏晋南北朝隋诗歌发展一瞥(代序) / 152

古诗赏析

- 《诗·大雅·桑柔》赏析 / 159
- 《诗·大雅·云汉》赏析 / 167
- 《诗·大雅·崧高》赏析 / 172
- 古诗《燕赵多佳人》赏析 / 179
- 古诗《驱车上东门》赏析 / 180
- 古诗《去者日以疏》赏析 / 181
- 古诗《凛凛岁云暮》赏析 / 182
- 古诗《孟冬寒气至》赏析 / 184
- 古诗《穆穆清风至》赏析 / 185
- 古诗《兰若生春阳》赏析 / 186
- 古诗《步出东门行》赏析 / 188
- 元诗管道升《题画》鉴赏 / 189
- 元诗赵雍《思归》鉴赏 / 190
- 元诗黄庚《枕易》、《秋色》鉴赏 / 192
- 元诗马祖常《踏水车行》、《石田山居》鉴赏 / 196
- 元诗陈孚《题和靖墓》、《远浦归帆》、《鄂渚远眺》鉴赏 / 200
- 元诗邓文原《陪高彦敬游南山》鉴赏 / 205
- 元诗贡奎《枪竿岭》鉴赏 / 207
- 元诗赏析三首 / 209

古典杂论

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与教育家

——《荀子十篇》前言与提要 / 216

《西游记》浅谈 / 220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若干问题商榷 / 230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若干问题商榷(续) / 242

郑板桥交游、行踪漫考 / 246

关于郑板桥思想 / 263

楚辞新论

屈原是楚辞的始创者

——与冈村 繁教授商讨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一辑,刊载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 繁先生一篇《楚辞与屈原》的文章(以下简称“冈文”),中心论点是:屈原是楚辞所集中描写的人物,但并不是楚辞的作者。就某些方面讲,我佩服冈村先生敏锐的观察力。例如他在文章中就《离骚》、《九章》与《九辩》诸作的类似句和诗型方面所作的分析研究,的确对探讨这些诗的作者及其创作先后富有启发。直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些诗的作者和写作时间,还存在着分歧,冈村先生意见对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有益。但是,读了冈文,我还产生另外一些感想。我以为,冈村先生不否认屈原其人的历史存在,这是他慎重之处,但在推断屈原与楚辞的关系时,由于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结论又显得不那么慎重了。下面试就冈文值得商榷之处,提出几点简陋看法。这些看法不一定形成对方论点的系统反驳,或许只能作为冈村先生进一步思索的一点参考吧。

冈村先生大作一条很重要论据,是认为汉初只说屈原是一位爱国者、忠臣,而没说同时是一位诗人,说屈原是爱国者兼诗人,这是从司马迁才开始的。而司马迁这种“屈原观”,是造成后世误认为屈原是楚辞伟大作家的权威性见解,它“规定和限制着后世的屈原观”。冈村先生接着考察了集中体现司马迁屈原观的《史记·屈原列传》,认为“《屈原传》所依据的资料数量不仅有限,其质量也未必都纯”,所以司马迁的屈原观也就未必正确无误。司马迁的屈原观既然有问题,那么屈原的

诗人地位也就岌岌乎可危,于是楚辞与屈原除作品与主人公的关系之外,也就没有任何瓜葛了。这里,笔者拟就两点来谈:一点,以屈原为伟大爱国者及爱国诗人的屈原观是司马迁以前就有的,并不始于司马迁;另一点,《史记·屈原列传》存在问题,并不等于屈原的爱国诗人身份也存在问题。

先谈第一点。肯定屈原的存在,是冈村先生不同于某些楚辞研究者的卓识。他在文中列举贾谊《吊屈原赋》、庄忌《哀时命》都曾提到屈原其人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他认为《史记·楚世家》有屈原使齐的记载,而《楚世家》“可能直接根据楚国某种档案记录之类的可靠历史资料而写成”,更是十分精辟的见解。但很可惜,他的这种求实的历史观点没有按原来的航向驶进一步,却中途搁浅下来。他认为“在大约作于战国末至汉初的时代较早的楚辞作品中(笔者按:冈文举《离骚》、《九章》、《九辩》、《招魂》、《远游》、《渔父》、《惜誓》、贾谊《吊屈原赋》、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诸作为例)”,“都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只是一味地吟咏仅作为忠臣的屈原悲痛的一生及其天地游行,对于他作为楚辞作家之事哪怕提及一句的作品,竟意外地完全没有”,“而它们全无例外地不提屈原是楚辞作者的这种普遍现象,看来似乎表明汉初以前人们所持有的屈原像,仅止是一位忠臣”。于是,冈村先生就作出了如下判断: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屈原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及爱国诗人的西汉以来的屈原观,很明显大大地超越了汉初以前的屈原观。

但是,事实是怎样呢?还得先考察一下冈村先生关于所谓两汉以来屈原观的形成的见解是否可靠。冈文大体上把这种屈原观的确立,归之于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确,司马迁一系列关于屈原的言论(主要是《屈原传》),确实确实给后世屈原观以权威性的影响,但却不能说它是来自司马迁的道听途说或者臆造。不错,《屈原传》是大段地引用了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话,这不过是在司马迁看来,刘安的话真正道出屈原《离骚》的伟大之处。我们不能设想,这些话只是刘安为了逢迎武帝喜欢,才说出的不着边际的虚妄之谈。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与之同时的司马迁绝不会摘取这样的材料进入他的伟大著作《史记》里边来。因为司马迁是一位具有崇高品格的正直严肃的“良史”。这样的史学家一时疏忽是有的,但绝不会不负责任地随声附和。所以,可以想见《离骚传》的话在基本史实上肯定有所依据,司马迁不过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予以转述罢了。

这里需要着重阐明的是,屈原是“爱国者兼诗人”的信息,是否真如冈文所说那样,在汉以前根本没有。笔者以为绝非如此。这里仅让我们以冈文所举的“时代较

早的楚辞作品”(篇目见前)为例。请看《渔父》一段话: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这篇作品经许多学者研究已证其非屈原亲笔所作,但如王逸《楚辞章句》所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大致是不差的。《史记·屈原列传》引用这段故事作材料,证明王逸的话言之有据。关于这篇作品,我不知冈村先生是否注意到“行吟泽畔”四个字。按着我个人的理解,这四个字已告诉读者:屈原是一位诗人。虽然我们还不能叫他作“行吟诗人”,然而他的的确确是一位诗人。他所吟诵的不可能是《诗三百》,也不可能是任何一首楚民歌,而只能是自述身世的“帝高阳之苗裔”(《离骚》)之类,或许就是“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怀沙》)吧。他满腹愁痛,如痴似狂,特借吟诵已作以抒忧。如果《渔父》这段话还有含混不清之嫌,那么《九章·悲回风》所述屈原作诗之事该是十分明白的:“眇远志之所及兮,恰浮云之相羊。介渺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郭沫若译:“我是旷渺地远怀着古人,就像那翱翔着的浮云。我心力绵薄有所难于理会,写出歌辞来以求明证。”)这里所赋之诗,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指《离骚》、《抽思》、《思美人》言,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以为即指该篇下文自“惟佳人之独怀兮”到“刻著志之无适”一段言。但无论如何,指屈原自己作品似无问题。如果这两句诗还嫌不足以说明问题,再让我们引《抽思》一段话看一看:

乱曰:长濑湍流,沂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后四句王逸注曰:“道思者,中道作颂,以舒怫郁之念,救伤怀之思也。忧心不遂,不达也。谁告者,无所告愬也。”“作颂”一语,意思明白,故历代注家多无解。马茂元《楚辞选》谓即“作歌”,姜亮夫以为即指《抽思》一篇而言,均确。姑不论《悲回风》、《抽思》的作者为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两篇都作屈原唇吻,是屈原自己的吟诵。这些是汉初前认定屈原是一位诗人(或楚辞作家)的明证。它说明汉初前的屈原观绝不像冈村先生所言仅止是一位爱国者、忠臣。所以明标是汉初人庄忌所作的《哀时命》、宣帝时人王褒所作的《九怀》(这两篇也包括在冈村先生认为未提屈原是诗人的作品之列),都有屈原作诗的记载:

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哀时命》)

悲九州兮靡君;抚轼叹兮作诗。(《九怀》)

据《楚辞章句》两首诗都是哀悯屈原之作,所以这几句诗无疑都是作者在叙述屈原之事。换句话说,也就是庄忌、王褒都认为屈原是一位能“属诗”、“作诗”的诗人或楚辞作家。

由于有上述一些诗篇在作着证明,我们才能够理解司马迁为什么那样肯定地承认屈原是一位楚辞作家,才知道他的屈原观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文献的根据。由此,我们才能够晓得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话,并非“尽量逢迎天子之意,有意识地企图树立《离骚》的权威”的胡说。也就是说,屈原作《离骚》汉初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所以,司马迁才理直气壮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屈原列传》)

写到这里,笔者觉得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贾谊的屈原观也作一点剖析。贾谊(前200~前168),汉初人,他做长沙王太傅大约在廿六七岁,距屈原死(前278年)不过百年。他过汨罗时作一篇《吊屈原赋》,说明屈原的故事他早就熟知,对屈原的为人他十分钦佩。《吊屈原赋》从整体上看,“谇曰”以前是仿效《怀沙》,“谇曰”以后是仿效《离骚》。从类似句看,“谇曰”以前的“乌乎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鸢翱翔。阍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与《怀沙》的“变黑以为白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笱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很明显有着承袭关系;“谇曰”以后的“已矣!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与《离骚》“乱曰”以后的“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相仿,而“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两句,与《离骚》“思九州之博大兮……尔何怀乎故宇”也有着模仿痕迹。十分凑巧,司马迁《屈原传》特别赞扬了《离骚》,又把《怀沙》全文引录在案,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是不是可以说,司马迁的“屈原观”与贾谊有着某种微妙的承递关系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在贾谊眼里屈原就是一位爱国者兼诗人,而《离骚》、《怀沙》就是屈原的作品呢?从这里,是否也可以看出淮南王刘安的赞扬屈原和《离骚》,与贾谊、司马迁有着上承和下传的关系呢?当然,贾谊这样的屈原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本源就是《离骚》等被认为是屈原作品的传世,以及前面所引述的《渔父》、《悲回风》、《抽思》等有关屈原“行吟”、“赋诗”、“作颂”的记录。此外,湘地父老对屈原的记忆犹新,贾谊又可从他们那里得到可靠的传闻。

下面谈第二点。《史记·屈原列传》从作为历史著作角度来讲,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青木正儿《新评楚辞》的一段话说得非常精辟,把《屈原传》的症结所在一语道破。为了论述方便,兹撮录如次:

这篇传记(按,指《屈原传》)的全文,在时代背景、有关《离骚》的评

论、对于昏君怀王的非难诸点上费去了很多笔墨,对屈原本身事迹的叙述却少得可怜而且模糊不清。据此观之,似乎在汉代即已对屈原的事迹不甚了然。《史记》的编者或许是因为同情屈原,因此想尽量把他的传记写得富有光彩。

《屈原列传》的问题,近一二十年以来在中国不断引起学者研究的兴趣,而且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文史》第一辑所刊汤炳正教授《〈屈原列传〉新探》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文章有的可能受到青木先生的启示,有的可能出于作者自己的发现。它们显然已比青木的意见有了更多的更具体的创获。冈村先生在文章注释部分,指出《屈原传》利用了《离骚传》(刘安)、《楚世家》、《周易》、《渔父》、《怀沙》诸文献材料,当然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有这些著述,都对《屈原列传》的研究作出了或多或少的新贡献。但是,除冈村先生之外,包括青木正儿先生在内,所有的学者都丝毫没有否认屈原作《离骚》的意图。因为他们都似乎抱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不管《屈原列传》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屈原是一位杰出的楚辞创始人并且作《离骚》,却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冈村先生与众不同,但是他在判断上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疏漏。例如他说:

与司马迁的卓越才识无关,《史记·屈原传》不论从其所据资料质量的低劣而言,还是从其所据资料数量的微少而言,归根结底,对于判断屈原的真相,不能把它看作极富可信性的传记。

据《屈原传》的实际情况,得出以上看法,当然不算过于偏激。《屈原列传》对于判断“屈原的真相”,确实没有提供十分科学准确的资料,以致它本身对屈原的被疏远、黜退、放流也弄得含混不清,屈原的生平简历更排列得颠倒淆乱,这些都是作为历史传记作品的不足与缺憾。但是,冈村先生据此却作出一个令人无法信服的结论。他说:

如此说来,确信屈原是楚辞文学伟大作家的古来传统见解,其出发点本身就早已根据薄弱了。

这样,《屈原列传》就从对判断“屈原真相”不具“极富可信性”,变成对判断“屈原是楚辞文学伟大作家”的“根据也薄弱”了。这种判断是不能使读者信服的。因为对判断“屈原真相”不具“极富可信性”,不等于对判断“屈原是楚辞文学伟大作家”也不能提供任何根据。如果真如冈文所言,连屈原作《离骚》这样一件史实也是假的,那么《屈原列传》岂不成了一纸胡言乱语的空文,还有什么史料价值可言。笔者认为这样评价司马迁及其《屈原列传》,是欠公允的。事实上,屈原作《离骚》

这件事肯定是从战国流传到汉初的。它的证明,就是上面已经谈到过的那些。而屈原作《离骚》,则又是司马迁为他立传的即或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汉初为什么同是爱国者、忠臣,独独屈原声望这么高,影响这么大?例如比屈原爱国、忠君事迹生动得多的比干、伍子胥等,却反居屈原之下?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屈原是很有才干的。但从客观的建树上来讲,却不能说他为国建立了什么赫赫不朽的功业。他在国内政治措施方面,成果赶不上商鞅、吴起;他在对外交际方面,收效赶不上苏秦、张仪。偌大一部《战国策》不见有他一个名字,甚至连对他十分倾慕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他的详细事迹也“不甚了然”。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在汉初却被到处传扬、歌颂,被极度同情、钦仰。恕我斗胆说一句,如果不是他创作了伟大非凡的《离骚》,不是他在这篇伟大作品中倾诉了“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热忱,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获得如此优厚待遇的。作为一位爱国者、忠臣,他的事迹并不比别人有什么特出的地方,直谏、遭谗、流放、自沉,这是历史上忠君爱国者的通常遭遇。然而在战末汉初却有那么多诗人墨客,一律用楚辞来描写他,同情他,赞扬他,追悯他,如果不是他创造了《离骚》这种骚体的文学样式,并提供了那么深刻、沉痛的思想感情方式,也同样是不可理解的。正因为屈原用他“惊采绝艳”(刘勰语)的文学创作,拨动了一代人的心弦,所以在汉初,上至皇帝老官、王公大人,下至孤臣孽子、浪荡文士,莫不翕然向风,好之不厌。《文心雕龙·辨骚》,说:“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汉书·朱买臣传》说:“严助贵幸,荐买臣,召之,说《春秋》,言《楚辞》。”甚至劳驾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为他立传。所以,可以断言,屈原在汉初所得到的殊遇,究其因,与其说作为一个爱国者兼忠臣,还不如说作为一个爱国者兼诗人(楚辞伟大创造者)来得更为切合实际些。

综上所述,可见屈原创作《离骚》这是起码从战国后期以来就已流传的说法。同时,这种说法有着若干很早的作品(或者说是屈原自己的作品)来为它作着铁证。因此,冈村先生所持汉初以前的屈原观仅止是爱国者、忠臣,而不兼及诗人(楚辞作家)之说,是不那么确实,或者说是根本靠不住的。

另外,冈文还涉及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也有必要在此一谈。该文提出:(一)《离骚》与《哀郢》是“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作品”; (二)而且两篇的任何一篇都不是屈原的作品,是出自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诗人的手笔”。冈村先生在论证他的前一看法时,举出两点证据:首先,他认为《离骚》“嗜好在一篇作品中重复使用相似的句式”(作者举“苟余情其信娉以练要兮——苟余情其信芳”,“忽

反顾以游目兮——忽反顾以流涕兮”，“芳菲菲其弥章——芳菲菲而难亏兮”等十二组例句），而《哀郢》中完全没有这种例子，所以两篇系“出自风格不同的作者之手”。其次，他认为《离骚》是“虚构的长篇作品”，而《哀郢》是“写实的短篇作品”，根据“如此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度……也不能不认为两篇的作者并非同一个人”。仔细研究上述两点理由之后，笔者认为冈村先生仅仅依凭两篇作品的纯属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就宣布它们属于不同作者，似难令人信服。第一，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作家在一首诗里使用了若干相似词句，在另一首诗里也必须这样做，即或他在第三、第四首诗里同样使用了相似词句，我们仍然没有理由作这样的要求。第二，我们更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作家既写了“虚构的长篇”就不能去创作“写实的短篇”，即或他一生写了大量“虚构的长篇”，我们也丝毫没有理由作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解释不了一个作家许多作品间艺术表现的差异性。产生这种差异有各种各样原因，例如作家境遇的迁徙，心绪的变化，兴味的转移，以及创作目的和创作冲动的不同等等，都可使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呈现出一定的不同风貌。我的意思不是说作家完全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创作习惯，只是说对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不可机械地强求一律，像某些一个模子造出的工业品一样。如《离骚》和《哀郢》，虽然在艺术表现和内容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但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如果仔细推敲起来还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如主人公的身世遭遇、思想气质，以及作品语言特色和“最相近的诗型”等等）。这种一致性，在仔细地研究了作者的生平思想之后，是谁都会感受得到的。

在论证前一看法的基础上，冈村先生论证他的后一看法（《离骚》和《哀郢》都不是屈原作品）举出三点理由。但是，由于前一看法很难站得住脚，所以后一看法的第一、二点理由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据，兹不辨。剩下的就是一个《哀郢》所反映的关于尧舜的评价问题。关于此点，冈文写道：

认为尧舜不慈的反儒教评价，就目前所知是始于《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的“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到了一般认为是汉初补作的《庄子·杂篇·盗跖》的“尧不慈，舜不孝”，这种思想才被继承下来。在此之前，这种口吻从未出现过。

所以他认为《哀郢》不可能是屈原作品。据传说，尧之子丹朱傲慢荒淫，所以尧不把天下传给他，这就是所谓“尧不慈”；舜的父亲瞽叟虐舜，舜不告而娶尧之二女，这就是所谓“舜不孝”。此说由来既久，世俗舆论方面也一直有两种相反的看法在争论。例如孟轲在《孟子·离娄》篇专为舜辩护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

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万章》还记载万章问孟轲，关于“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是否怨父母，“舜之不告而娶”是否不孝等问题。这说明此种看法起码在战国初期即已流行于世。所以，我倒以为《哀郢》比《吕氏春秋》的记载要早，而它不过是驳斥了当时世俗的一种见解而已。

总的说来，冈村先生关于楚辞主人公与作者区别的立论是难以站住脚的。但这并不是说冈村先生的文章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笔者觉得，冈文开头所提出的若干疑问，以及后面对楚辞类似句、诗型所作的剖析，对研究这些作品写作的先后乃至其作者，还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这只能在区别哪些是屈原作品哪些不是屈原作品的范围之内进行，而要最后作出这种确认还必须结合作品内容等方面找出更为确凿可信的证据。

鄙见所及，不知冈村先生以为然否？

——原载《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第3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屈原被疏后的经历问题新考

关于屈原被疏后的经历(包括被放逐的次数、时间、地点)和水死的时间问题,当前学术界的说法尚存在着分歧^①。本文想以《九章》为主,结合《史记·屈原列传》等史料的记载,对此问题作一点新的探讨,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一、先谈谈《九章》的问题

《九章》是直接反映屈原生平几个关键时刻行踪的重要作品,对研究诗人的经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在运用《九章》来推断屈原的生平时,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待弄清,这就是:(一)《九章》是否全部是屈原的作品;(二)《九章》究竟创作于什么年代。

关于前一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见解:一是认为九篇全是屈原之作^②;另是认为前五篇(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是屈原的作品,后四篇(包括《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并非屈原所作^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与本文论述重点关系不大,所以不准备进行更多的讨论。这里仅以没有争议的前五篇为主要依据,对有争议的后四篇暂不拟涉及。

关于《九章》的写作年代问题,因与本文关系密切,有必要认真地谈一谈。王逸《楚辞章句》说:“顷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认为《九章》全部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之后。洪兴祖、朱熹均服膺王说,后世学者亦多作此主张。但是,无论从作品本身或史料的记载来看,王逸的说法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先从《九章》本身看,证明其非顷襄王时所作者有如下几点:(一)《九章》所记叙的事件都是切指诗人在楚怀王时的遭遇。如从被疏写到欲陈情而无路的极度苦闷心情;从回顾往昔如何与楚王“成言”,写到后来楚王怎样变心,疏远乃至放逐了他;从他如何地坚持自己的美好节操,绝不违志从俗、同流合污,直写到产生退居、远逝的念头……这些都是发生在怀王之世。(二)《九章》所言“君”、“君王”均指怀王,无一是指顷襄王。从诗篇所缕述事件的连贯性来看(即从始至终都说的是发生怀王时事),其所称“君”字亦应有它的一贯性,即从始至终亦应指怀王,而不可

能有指顷襄之处,诗中也绝看不出有这种转折的任何迹象。如《惜诵》:“忘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证之不远。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众“君”字固指怀王。《抽思》说:“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显然亦指怀王。即如《哀郢》之责君“憎愠怆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脩同修,下同),又何尝不是指怀王?同诗中“哀见君而不得”之“君”,亦必指怀王无疑。(三)特别值得注意,《九章》指责君王信谗放己的糊涂,埋怨君王逐渐把己忘掉,抨击群小对君王的包围……语气都作现在时口吻。即这些事当时正在或继续在进行中,而不是缅怀遥远的过去。凡此都是《九章》作于怀王时的明证。总之,《九章》绝不涉及顷襄王时事,即如可以肯定作于顷襄初年的《涉江》、《怀沙》两篇作品亦无涉及顷襄之语。盖屈原与顷襄王在政治上本无此等机缘,在思想感情上亦不应有此等纠葛,再加在顷襄之世又无更多的政治活动(尤其没有《九章》中所陈述的那些曲折的政治遭遇),故与顷襄无更多的话可说。所以,作于顷襄之世的《涉江》只悲愤地叙述他由陵阳被迁逐到湘沅一带的经过,《怀沙》则仅抒发他从沅水上游的溁浦一带北上长沙、汨罗时的思想感情,而绝不再具体涉及过去那些政治上的坎坷经历。因此时怀王已故,重提此等话语已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了。这些都是从作品本身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的,是《九章》作于怀王之世的极可靠的内证。

其次,《屈原列传》关于屈原晚年的记载,更可与《九章》所记叙之经历互为参证,证明《九章》主要是作于怀王之世。《列传》说屈原在顷襄王即位之初就遭到了迁逐,而且到达放地不久就投汨罗而死。这是很值得读者玩味的。可惜历来的楚辞研究者竟少有人能仔细审慎地思索过。例如下面的一段话:

长子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疾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这段记载说明:(一)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屈原遭到迁逐,是在顷襄王即位的初年;(二)屈原被逐之地既近汨罗,当即《涉江》所叙之湘沅一带;(三)屈原在迁地江畔行吟,经过一个很短时期,就作《怀沙》之赋,投汨罗江而死了。《列传》用较多笔墨记叙屈原在怀王时期的活动,而记载顷襄王时的事迹却如此简略,这绝非仅仅由于史料阙如。我们知道,为了调查屈原放逐的事迹,司马迁曾“浮于湘沅”

(《太史公自序》)，“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屈原列传》)，而所采亦不过寥寥。这说明屈原此时必存活不久，活动不多，而其范围又只限于沅湘一带，故史家所书如此。但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学者(甚至是很有成就的楚辞专家)，竟完全无视《史记》这段十分重要的记载，对屈原在顷襄王之世的活动作这样或那样的假想和推测，这就未免近于子虚乌有，其可靠程度当然要大打折扣。因此，把《九章》的写作定在顷襄王年代，是没有任何史实做根据的。

由上面的简单考察，可见《九章》的写作年代主要是在怀王时期，个别篇章如《涉江》、《怀沙》即或是作于顷襄王之世，也肯定是它的初期，绝不可能离得太远。这是本文一个基本看法。

二、关于屈原被疏后的经历问题

根据以上的看法，下面试对屈原被疏后的经历问题作一点新的探索。

屈原被疏后遭到放逐，是大家公认的。但是究竟放逐过几次，地点在哪里，时间在何时，却是古今学者言人人殊。司马迁、王逸对流放次数言之不明(然细绎其说，亦可发现他们都是主张二次流放的)。班固《离骚赞序》首主一放之说，刘向《新序·节士》始标二迁之论。后世学者虽各有依违，然其取舍大概均不出此。主一次放逐者，或不言放地，或认为至汉北是被疏，至陵阳(或辰阳、溁浦)才是流放；主二次放逐者，则认为汉北、陵阳均为放地。至于被放时间，一次放逐论者大多认为顷襄之初，二次放逐论者则又人主一说，各言其是。如洪兴祖《楚辞补注》说：“考原初放，在怀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复召用之。三十年，秦约怀王与会，原谏止，不从。怀王遂死于秦。顷襄王立，复放屈原。”游国恩《屈原》则认为，第一次放逐是怀王廿四、五年，第二次是顷襄王时^④。这些主张虽都有一定根据，然按之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犹觉未能尽惬人意。所以，对屈原被疏后的经历，还有重新加以考虑之必要。笔者认为，屈原生平事迹虽属渺茫，但《九章》向我们展示了汉北、陵阳、溁浦、长沙等地址，就是很确实的依据。参之《屈原列传》所提供的见疏、被绌、放流、顷襄王怒而迁之、自投汨罗以死(为了醒目，我把它简化为“疏、绌、流、迁、死”五个字)等线索，那么屈原被疏后的经历就可大体被推知出来。据此，笔者经过详细考较，对屈原被疏及其后的经历作如下推断：

(一)遭谗被疏。《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解释说：“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谗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自白也。”他把“致愍”理解为被疏，极确。诗的中心就是诉说

忠而见疏的冤屈,指控谗言的诬枉不实。诗虽言“忠何罪以遇罚”,但观“欲高飞而远集”,“愿曾思而远身”(后一句郭沫若《屈原赋今译》译为“我愿深思远虑而自行隐藏”)等句,说明屈原还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还没有遭到任何惩处。“遇罚”是指遭到被疏远的恶报而言。蒋骥以《惜诵》为“廿五篇之首”,是很有道理的。《史记·屈原列传》载:“楚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怒而疏平。”明确揭示屈原被疏的原因是遭谗,与《惜诵》所说基本合拍。从屈原的全部政治经历看,无疑这是他所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被疏的具体时间,《列传》只说:“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纵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云云,语焉不详。据《楚世家》考知,张仪至楚是在怀王十六年,则屈原被疏当在此前。然《新序·节士》又谓,时屈原尚未被疏,张仪至楚是为了离间屈原与楚怀王君臣关系。与《史记》所载张仪入楚屈原已被疏有异。这说明,屈原被疏与张仪入楚时间不会相去太远。故可把被疏时间定为十六年前后^⑤。屈原被疏之后,可能继续留在郢都。此时他既是被疏而不是被绌(疏是疏远不再信用,绌是黜退免职,二者有别,《列传》此点叙述得颇含混),所以还不可能去汉北。此后,楚怀王受了张仪的欺骗,又想连齐。大约怀王十七年末或十八年初,屈原曾有使齐之行。《楚世家》载,怀王十八年张仪第二次入楚,被囚,贿赂靳尚、郑袖而得脱。《屈原列传》说:“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这是他被疏后唯一的一次参加朝廷的政治活动。

(二)待罪汉北。《抽思》有“有鸟自南,来集汉北”的诗句,指示着屈原是从朝廷来到了汉北。这件事肯定是发生在被疏之后与流放陵阳之前。谓其发生在被疏之后,无需详辩;谓其发生在流放陵阳之前,有必要稍加说明。据《哀郢》载,屈原曾经被放于陵阳,而据《涉江》、《怀沙》来判断,屈原从陵阳被迁逐到辰、溆一带,之后就北上长沙、汨罗投水而死。所以,屈原来汉北之事不可能发生在此后。故在他的全部经历中,汉北之行只能是在被疏之后与流放陵阳之前。这是屈原遭遇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他来此的缘由,很可能就是《屈原列传》所说“屈原既绌”的被黜。至于为何被黜,当是屈原对怀王进行过一次态度很激烈的谏诤,从而更加触怒了怀王。怀王不杀张仪,虽因屈原之谏而有所追悔,但仍欲实行和秦的国策。《楚世家》说:“(怀王)廿年……楚王业已欲和于秦。”内政外交便都有走上错误路线的危险。屈子的强谏很可能便是这个时机,于是他被发遣到汉北待罪(杨惊《荀子·大略》注:“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即待罪之意)^⑥。据屈原作品披露,遭谗是造成他被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忠言直谏则是他